

YAN'AN JING SHEN

主 编 黄 宏
副主编 洪保秀 郭海军

弘扬革命精神系列丛书

延安精神



人民出版社

YAN'AN JING SHEN

主编 黄宏
副主编 洪保秀 郭海军

弘扬革命精神系列丛书

延安精神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 春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精神/主编:黄宏 副主编:洪保秀、郭海军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

(弘扬革命精神系列丛书)

ISBN 7-01-004812-6

I. 延… II. 黄… III. 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190 号

延安精神

YAN'AN JINGSHEN

主编:黄 宏 副主编:洪保秀 郭海军

人 人 读 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812-6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主 编 黄 宏

副 主 编 洪保秀 郭海军

撰写人员 黄 宏 洪保秀 庞仁芝 杨永利
郭海军 曹纪刚 李 刚 徐锡岩
陈良兵

代 前 言

赋予延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2004年7月6日)

李 长 春

我们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的指示精神,要结合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赋予延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使延安精神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的核心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一道,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我们今天讲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以毛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以人为本的群众观，广纳群贤的人才观，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要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着力解决改革发展当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扎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摘自李长春同志在参观“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大型展览时的讲话

目 录

代前言 赋予延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李长春(1)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1)

- 一、陕北十三年 (1)
- 二、中国革命精神的结晶 (23)
- 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传家宝 (34)

第二章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43)

- 一、双手搂定宝塔山 (44)
- 二、一旗独树扬天下 (71)
- 三、雄鸡一唱天下白 (85)

第三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99)

- 一、在曲折中探索，在实践中形成 (100)
- 二、延安窑洞里的马列主义 (114)
- 三、不断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33)

第四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49)
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149)
二、群众路线是我们的工作路线	(168)
三、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	(185)
第五章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06)
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07)
二、艰苦朴素，厉行节约	(226)
三、励精图治，锐意进取	(239)
第六章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256)
一、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与延安精神	(256)
二、赋予延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281)
三、弘扬延安精神，实现民族复兴	(298)
后记	(321)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延安——外国人眼里的红色堡垒，中国人心中的革命圣地。

滔滔延河，承载了民族的重负；巍巍宝塔，唤起了备受欺凌的人民。1935年10月，党中央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了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汇集了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这里艰苦奋斗了十三个春秋。他们以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和勇于开拓的创业实践，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武装斗争的统帅部，并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创造了辉煌业绩，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振奋之魂——延安精神。

延安的山水，记载有革命前辈的足迹和英名；延安的窑洞，蕴藏着炎黄子孙的理想和传统；伟大的延安精神成为我们战胜困难、开拓进取的不竭精神动力。

一、陕北十三年

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在毛泽东的

延安精神

领导下,胜利到达了陕北。从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起,至 1948 年 3 月 23 日东渡黄河转向华北为止,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领导中国革命,前后历经十二年五个月二十六天,习称“陕北十三年”。这十三年,根据历史进程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变化,又划分为三个阶段:从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先后以瓦窑堡、保安为中心,到 1937 年 1 月 13 日进驻延安,历时约一年三个月,为第一阶段;从 1937 年 1 月 13 日,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后方,到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攻占延安,摧毁我党领导中枢,1947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历时约十年两个月,为第二阶段;从 1947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到 1948 年 3 月 23 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到达华北,历时约一年,为第三阶段。

陕北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为中共党史,为中国革命史,为中国历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这一笔,竟是整整的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陕北人民用他们的小米,养育了我们的军队,养育了我们的党;在这十三年中,我们的党扎根在黄土地中,经受了无数次的考验,更加成熟了,也更加坚强了;在这十三年中,我们的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度过了那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最终走向了胜利和辉煌。

对于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早作了评价,他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具体说,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总之,它是中

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

(一) 早年革命发展的沧桑史

陕北黄土高原是一个贫瘠困苦的地区，延安城就坐落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循着古人的足迹，追根溯源，延安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传说“人文始祖”黄帝及其部落就兴起在这块土地上，后来黄帝族沿洛河南下，并东渡黄河才定居于河北涿鹿。黄帝完成统一中原大业后，仍叶落归根，安葬于桥山之巅，这就是今天的黄陵。史籍还记载，远在夏代，这里就出现了村镇，公元前221年，秦朝在延安一带建有上郡。南北朝时期，建起了城池。隋朝初年，以延水取名为延州。唐、五代、宋、元等朝代，又称为肤施。直到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才改为延安府。

自隋朝以来，延安一直都是郡、州、道、路、府的所在地，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延安至今还留存着历代人民创造的古老文明。城东嘉陵山上，屹立着唐代修建的高达44米的九层宝塔，它是延安人民英勇顽强的象征；城北清凉山间，殿宇洞窟星罗棋布，最有价值的是宋代开凿的万佛洞，它是延安人民精湛艺术造诣的代表；城西凤凰山顶，有北宋范仲淹督建的镇西楼，它是延安人民保家卫国坚强意志的体现。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陕北和延安曾迎来了无数名臣武将和仁人志士。战国时期著名兵家吴起，任魏将时屡建战功，被魏文侯封为西河守，吴起镇就是吴起坐镇陕北的记载；秦皇、汉武曾经驰骋陕北，抗击匈奴；秦朝大将蒙恬、公子扶苏，汉朝名将李广、卫青，唐朝老将尉迟恭、郭子仪等都镇守过延安；北宋将领韩琦、范仲淹、庞籍、狄青、杨文广、沈括等也都先后驻防延安，抵御西夏的侵扰。

可惜,这些历史名人的足迹大都被巨变的沧桑所淹没。

陕北延安的小米还养育了众多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隋朝时刘加伦聚众 10 万,大闹延安府,名震遐迩;生长在延安的韩世忠抗金救国,成为南宋民族英雄;延安南面的万花山下有个花源头村,当年花木兰就从这里替父从军,成了女中英杰;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陕北农民领袖点燃的起义烈火,烧垮了朱明王朝;清朝时,陕北回民为反抗压迫举行过多次暴动;民国初年,陕北张九才也举旗造反。这些英雄业绩给黄土地增添了光彩的花环。

延安的历史悠久,陕北的豪杰辈出,这里却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无闻,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在黄土高原产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给西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

被埃德加·斯诺称为“现代东方罗宾汉”的刘志丹出生在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在早年中学时期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启蒙,1926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成了具有国共双重党员身份的青年军官。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逃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清洗”,在上海为党做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后,于 1928 年回到故乡,同另一位共产党员谢子长领导陕北武装起义,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他们相继举行了清涧、渭华、旬邑武装起义,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并在 1932 年 2 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同年 12 月,成立了红 26 军第 2 团。红 26 军成立后,积极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组织农民,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游击根据地。此后,几经挫折,成立了红 26 军第 42 师,重新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 年 2 月,陕甘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我红 42 师和游击队互相配合,经过 5

个月的苦战，歼敌三千余人，打破了敌人对陕甘边的“围剿”，巩固了根据地。11月7日，在南梁梨园堡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23个团四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特委为统一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于2月5日在安定县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惠子俊为书记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以谢子长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前敌总指挥部。从5月上旬到6月下旬，陕甘和陕北红军主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转战陕北地区，歼敌三千多人，攻占了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安定、保安（今志丹）等6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敌人的“围剿”再次被打破。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在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到环江、东临黄河的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7月下旬又调集东北军11个师、陕北军阀井岳秀2个师和晋军李生达6个旅的10万人，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妄图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法，将陕甘红军主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彻底摧毁陕甘根据地。刘志丹根据敌人部署尚未就绪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8月，红军主力先打入陕之晋军，取得慕家塬、定仙墕、枣林坪战斗的胜利，迫使晋军退回黄河以东。我军随即以一部南下富县、甘泉，钳制东北军。红军主力北上横山，打击井岳秀的86师，因地形不利未能取胜。

正在这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转战到陕北延川。9月16日，陕甘红26、27军同红25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

任副书记，并将红25、26、27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七千余人。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了抗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当时，南线东北军兵力比较分散，敌第67军的110师及129师（欠一个团）已进至延安，其107师、117师及129师一个团分驻洛川、富县、甘泉地区。根据这种情况，红十五军团决定“围城打援”，即以地方武装包围甘泉，主力埋伏于甘泉以北的劳山地区，歼灭由延安增援之敌。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伏击敌110师，击毙其师长何立中。接着我军南下，又于25日在富县榆林桥，歼灭敌107师619团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这两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打破敌人的“围剿”奠定了基础。

然而，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发展之际，陕甘根据地遭到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中共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他们全盘否定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长期英勇斗争的历史，给不同意错误路线的同志扣上“右倾取消主义”、“反党派别”的帽子并加以逮捕。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他们便将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关押，无一幸免，其中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杨森等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他们对被捕同志残酷斗争，严刑逼供，有两百多位同志被杀害。“肃反”扩大化造成了陕甘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这时，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完成了对根据地新“围剿”的部署。外受敌人重兵包围，内有“肃反”的危害，使陕甘根据地处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

了光明,而这一线光明却被乌云笼罩。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才拨散乌云见晴天,挽救了陕甘根据地,使陕北和延安进入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二) 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党中央并没有将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而是打算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过了湘江封锁线后,这个意图被蒋介石发觉,敌人便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重兵布防,中央红军到湘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这时,党中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红军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此后,关于中央红军在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提过多种方案,进行了长时间的选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党中央的注意力在南方,曾计划在川黔边、云贵川等地建立根据地,都没有实现。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后,正值日本并吞华北、民族危机加深之时。所以,党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战略转移的处境,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这样就把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有机结合了起来,给艰辛转战中的红军指明了新的方向。可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极力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提出南下川康的逃跑路线。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6月28日,

^① 参见《延安功业》,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8—13页。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就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① 中央政治局又分别于 8 月 6 日在沙窝、8 月 20 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②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经草地同时北上。毛泽东等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穿越了纵横数百里的沼泽、草地，于 8 月 27 日到达巴西地区。但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越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以后，又违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令左路军停止前进，并发电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掉头南下，向天全、芦山地区退却。当张国焘的无理要求被党中央拒绝后，他又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南下。在这紧急关头，中央政治局于 9 月 9 日晚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单独继续北上。这样，由于张国焘破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就成了泡影。党中央北上到何处落脚，又成为战略转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经过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在中苏边界创造一个根据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5 页。

8 ^② 同上书，第 497 页。

地，再向东发展。那时党中央之所以提出打通国际联系，而没有考虑落脚陕北，是因为转战中对陕北的情况一无所知。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七八千人，经过残缺危险的栈道，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了长征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岷山，于9月21日抵达甘南宕昌县的哈达铺宿营。在这里，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党中央对北上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下辖3个纵队共七千多人。同时，党中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这时，中共中央搜集到一些国民党的报纸，从中得知陕北仍然保存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出发北上，在9月27日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当地一所学校为红军提供了许多报纸、杂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中进一步了解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了解了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了日寇加强侵略华北的严重形势。于是，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把长征的目的地定在陕北，这是英明的决策。因为长途跋涉的红军，纵横11个省，打了无数次恶仗，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兵力大减，体质下降，急需安个家休整和恢复。如果再走下去，红军就有被拖垮的危险。当党中央把在陕北落脚的决定告诉部队后，全军为之振奋，称为“天大的喜讯”。榜罗镇会议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加快了北上速度，先是突破西兰大道封锁线，接着翻越六盘山高峰。战士们高举的红旗迎风招展，红军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壮观万分。当时，毛泽东感到“豁然开朗”，即兴赋词《清平乐·六盘山》，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